

2002 年 12 月 31 日高雄遠距教學「色情文化與情色文化」

主講：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何春蕤老師的網頁及相關論著](#))

社會運動，包括婦女解放運動，不能只是在恐懼的基礎上運作，而要向著一個願景前進。因此，單單使女人脫出危險和壓迫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想：要前進到哪裡去？我們要向著愉悅、能動力、自我定義前進。女性主義不能只是減少我們的痛苦而已，她必須能增加我們的愉悅和歡樂。

--美國女性主義者 Carol Vance

一、「色情」的誕生

18 世紀以前，西方世界物資的匱乏、印刷術的不普及、識字人口的有限、交通的不便等等現實條件，都使得所謂色情（也就是當時所謂的淫穢）材料只在有限而且頗為同質的優勢階級小圈子之內流傳，個別家庭中的少數淫穢材料流通有限，因此這類材料並未引發明確定義的警覺動力，也沒有特別訂定名稱的必要

西方色情歷史學者通常以 18 世紀中期到 19 世紀為「色情」正式誕生的時代。（1）就大脈絡的氛圍而言，當時因著工業生產聚集了大量離鄉背井的勞動人口，形成現代都市的雛形，人際互動關係急遽的趨向貼近與複雜化，家庭結構的鬆散化、性關係脫離父母和婚姻的框架，這些現象都使得衛道之士憂心，對於體現了性倫理之改變的東西當然會特別義憤填膺。（2）就文化生產而言，同時科技的發展大量降低了印刷成本，新興中產階級又有著新生產模式所帶來的閒暇時光，對通俗消遣出版品的需求大增。（19 世紀小說也是在這個脈絡中誕生的，而小說中就常常描繪了那些沒事在家閱讀大量通俗雜誌和小說的中產婦女）。（3）就呈現方式而言，除了原有的木刻圖像之外，自從 18 世紀以來便流行民間的書寫形式——**寫實主義小說**——也以其逼真寫實貼切日常生活而扣緊中下階層的人心，更提供了情慾材料的主要敘事形式。色情小說大量浮現，廣泛流傳，更讓憂心的衛道之士覺得需要好好整頓閱讀材料，因此迫切想要好好定義「色情」，以便有效遏止。

更重要的是，個人化的閱讀實踐使得整體社會思想與價值觀的統一愈來愈困難，識字和出版的普及更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觸到情慾材料，在這些風雲際會、階級疆界游移的歷史社會文化變遷中，情慾材料日漸升高的可見度遂凝聚了有勢／有識之士的文化焦慮，也促成各種呼籲淨化社會的道德信念與說法浮現，形成主流論述，要求有確定的判準來鑑定並隔離「色情」。從這個角度來說，「色情」之所以被創造出來作為一個管制文化產品之流通的範疇，乃是為了預防「文化民主化」（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有趣的是，推動這些判準、隔離、甚至禁絕的人，從來不會直接承認自己厭惡色情，而總是

把理由推到別人身上，說禁絕色情是為了那些需要被管理、被保護隔絕的人，以免「無法辨別是非善惡」的心靈因著接觸這些讀物而罪惡墮落。（網路出現後的另一波色情恐慌則是另一個例子。）

出於這些考量的反色情論述因此經常建基於一種帶有強烈階級、性別、年齡假設的「保護主義」立場，認定只有成年（而且中產有智）的男人才有足夠理智和自制力量來使用或觀看色情材料，而（特別是年輕女性及孩童的）脆弱純潔心靈則必須加以隔離保護才不會受到污染。在這種社會區隔的需求之下，當時有關色情的論述專注於監控及限制色情材料的展示及擴散管道，對色情材料本身的內容則鮮少分析，只是嚴厲的假設它們淫穢不當，不能讓道德感脆弱的人觀看而已

保護主義的立場總是把自己放在優勢、關懷、施恩的位置上，以自己的判定來籠罩弱勢者的生命。

值得深思的是，保護主義式論述雖然似乎假設需要被保護的觀看主體是純潔脆弱的，但是座落於 19 世紀的另一些發展中來觀察時，個中假設的主體卻又顯出一些不同的面貌。性歷史的研究者指出，從 18 世紀開始，歐洲便興起一股對孩童手淫之害高度關切的氛圍，在當時的相關論述中，手淫不再只是違背宗教和道德的偶發行為，而被視為敗壞人格、腐化心靈的大惡。相應而生的除了各種警告父母小心監視子女獨處時光的宣傳單張之外，還有一些新的刑罰措施出現，例如對情慾越軌的男孩施行陰莖套，或甚至對無法禁絕手淫的女孩施行陰蒂切除手術。

這些論述與嚴厲措施的出現，顯示保護主義論述中所假設的那些需要接受保護的主體其實並非純潔脆弱，容易受傷害。相反的，色情歷史研究者進一步指出，這些假設需要被保護的主體事實上是有特定性別的：她是「精力充沛的發電機，她的行動混亂而放蕩，隨時利用機會氾濫、越過男性霸權設立的隄防，不但不謀求文明的進展，反而造成文明的崩裂，歸回無秩序，回到起始之時那種無結構的狀態」。換句話說，保護主義所假設的女性主體不但不是被動的、無力的，相反的，她們天生就有強大的情慾動力，甚至強大到有可能搖撼整個社會結構。從保護主義式反色情論述這種對於女性主體的矛盾看法來觀察，對於色情的定義和嚴厲檢查也反映了對女「性」主體的畏懼與壓抑。

二、女性主義「反色情論」的浮現

反色情論述直到 1980 年代前後才在女性主義的色情批判中找到了超越保護主義的說法，也找到了新的熱切力量。

新的對色情的熱切譴責多多少少標示了西方社會有關性（sexuality）的社會呈現的巨大轉變。1950 到 1970 年代間的性革命，不管是在單身女性人口的流動、求偶之活動模式、邊緣社會運動的人際集結方式、性生活及婚姻的諮詢論述、性別角色的游移與變遷、避孕措施的研究與普及、性觀念的開放與性實踐的可見度上，都創造了一個努力將性自然化、合理化、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和這些具體發展相輔相成的則是益加細緻多樣而且迅速擴散的性商品化趨勢，此外，攝影科技的精進逐步加深了影像中個別身體部位的性化（sexualize），再加上對既有文化

資源的盡情挪用轉化使得色情敘述不愁沒有現成的素材，色情文化就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下逐步建立其生產體制，而且不斷調整自身的訴求定位，開發新的消費人口群，透過市場來普及這些邊緣的情慾模式。

令人深思的是，**唯有當性的社會呈現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sex) 已經開創出更大的性言論自在空間時，性在無數個別女人生命暗室中的陰暗痛苦才得到了訴說的出口。**於是在性革命帶動的情慾開放空間中，1970 年代形成的無數女性意識覺醒小團體也同時逐步浮現了對性騷擾和強暴的控訴，這些陰影所勾動的同理心以及恐懼 / 痛苦，甚至掩蓋了當時女人日漸擴大的情慾可能和愉悅，並急迫的促使女性主義者尋求文化解釋，以謀求有效的方法來控制這種惡劣事件的持續發生。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被視為最具像展現男人對女人的敵意和宰制的色情材料及工業立刻成為被抗議的焦點目標。從 Robin Morgan 的經典文章“Theory and Practice: Pornography and Rape” (1974), 到 Susan Brownmiller 的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1975), 到 Catharine MacKinnon 的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1979), 到 Andrea Dworkin 的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1981), 反色情在理論上的積累聚焦了女人的憤怒和控訴，形成 1970 年代末期各種反暴力、反色情的運動組織以及美國各大城市「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 的抗議遊行，矛頭則指向處處可見、在正當性上本來就很脆弱的色情行業及產品。

與過去不同的是，女性主義的反色情論述不再倚賴保護主義反色情論述中像「淫穢」這種模糊的道德標籤；相反的，**女性主義者積極對色情材料的性別內容、意識形態、及其產業結構加以深刻分析，把色情由道德的領域移入政治的領域，顯示色情中的性別歧視和對女人的踐踏，以權力的角度來談色情之不當。**這種新的色情批判扣緊了當時情慾文化變遷的步調以及女性生活中的現實感受，成功而有效的動員了女性群眾加入抗爭。

不過，在這裡必須指出，**女性主義反色情論述的出擊同時也是 1960-70 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原先抗爭焦點的一種轉移或減縮。**例如，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在批判色情時最常使用的概念就是「物化」(還可延伸出「性化」及「奴化」來)，然而這個原本借自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的有力概念，在被女性主義者挪用來批判色情的過程中，卻經歷了一定程度的意義窄化。

物化 (objectification) 字面上就是「對象化」 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物化就是透過人類的組織 (也就是社會分工) 把某些東西當作勞動的對象，當作可以被控制、分解、操弄、改變、轉型、交換、消費、生產 的東西來操作。但是人類的勞動不但物化了自然，也必然會物化自己的身體，使身體成為一個可以被控制、操弄、改變、生產 的勞動器官。也就是說，人在改造或物化自然時，也必須順應自然來改造或物化自己。當然，人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採用不同的人類組織和社會制度去進行物化，當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成為主宰時，物化就主要採取了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的形式，商品化的形式則大大便利了物化的深度、速度與強度。當人們面對這樣的「物化 商品化」的實際過程時，看不出來這個過程依賴著社會分工的特定形式，而以為是物本身的特質導致了商品化的過程，這樣的錯誤認知就是「物化」。

在第二波婦女運動早期，「物化」指的是男人「以性功能和性吸引力為標準

來衡量個別的女人，把女人當成物品，不談對等的關係，而把出於男人本位的狂想以及過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投射到真正的、活著的、呼吸著的女人身上」。事實上，1970年代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物化」的例子也十分多樣，其中包括：男人不顧女人意願，單方面的決定眼前的女人必須滿足他的需求；或者有些男人雖然欣賞獨立自主的女性，但是卻仍然努力嘗試把她們模塑成和她們人格相左的傳統賢淑婦女形象；或者女人在職場上經常感受到她們的性別決定了她們的工作性質，她們是否展現女人味甚至可以決定她們是否受雇；或者女人在男女互動中常常只被視為可能的性對象等等。這些都是「物化」的例子。

而早年女性主義使用「物化」觀念來進行具體批判時，不但指向「物化」的現象，更從物化進一步指向社會建制。她們指出，女人不但被當成滿足男人需求、討男人喜歡的性對象，更普遍的是，她們同時也經常被視為（特別是在家庭中扮演的）滋養的、支援的泉源，例如使男人沒有後顧之憂、作為男人的「孩子的媽」、為男人提供浪漫愛情的對象、照顧男人的親屬、展現女人的賢淑美德等等。在這些身份定位上，女人並沒有自我的空間，她的價值由她在男人想像中的定位以及她所能提供的服務來決定，她被剝奪了所有的主體性。因此，當時的女性主義反對「物化」，也就是抗拒女人被命定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各種角色，也就是抗拒既存的許多社會建制，如一夫一妻制婚姻、母職等等。

然而，1970年代逐漸加速的性的商品化和女性身體形象的商品化，加上當時在影像及意識形態研究理論方面的長足進展，都使得女性主義「物化」觀念的針對性和意義有了重要的轉變。「物化」所指涉的不再是父權社會男性對待女性的「普遍」態度和角色規範，而被窄化理解為「特別」是商品銷售系統中的符號運用，也就是專指色情或媒體中的女體呈現。換句話說，晚期女性主義所抗爭的「物化」，最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化趨勢，至於父權體制中那些很根本侷限女人生命的制度面向（如家庭、婚姻、母職等等）都不再被列為「物化」的主要內容。

在這裡顯示的是，女性主義的色情批判有其誕生的歷史脈絡，也因此有其發展過程中的特殊聚焦點。諷刺的是，這樣的批判動力誕生自1960年代性革命所創造的女性情慾空間與情慾意識，卻很快形成了對女性情慾的新定義與限制。

三、女性主義色情（性）辯論

女性主義論述對色情的批判在1980年代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領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 Catharine A. MacKinnon 和 Andrea Dworkin 進一步指稱色情是性別歧視的中心環節，將色情描繪為女性主義的首要敵人，她們對色情的批判直指男性強權和色情之間循環互通的權力關係。Dworkin 認為無論怎麼做，無論當事人之間的具體關係為何，無論他們有何種感受，「性」基本上就是對女人不利的事：「事實上，性就是對女性的征服和占有」。而色情既以描繪性交為主，那麼，包括男性的性器官、色情影片的鏡頭、甚至寫作色情的筆，都被視為是男性用來貶低女人的具體武器。這麼一來，色情就不是什麼意識層面的抽象產物；相反的，色情是男性權力的展現。MacKinnon 甚至直言：「色情不是和在別處建構的與現實隱約相連的影像，不是什麼扭曲、反應、投射、表現、狂想、再現、或象徵

色情就是性的現實」。

這種把色情視為父權的體現、父權的核心的說法並沒有被所有的女性主義者接受，很多肯定女性主體和情慾的女性主義者指出，反色情運動視色情為首惡的批判有其盲點。首先，反色情運動假設女性主體受色情之害最深，因為女人在其中被呈現為「非人化的性玩物」，可是這些反色情的批判卻沒有以同樣的熱切急迫來評估其他同時存在而且常常有同樣效果的文化論述——包括由家庭及教育中的性別養育方式、傳媒及語言中的性別刻板形象、到法律及經濟結構中的性別不平等規範——是否在性別建構中扮演著更不為人察覺也因此是更為深刻的塑造功能，是否更廣泛的奪去了女人定義自己的權力，扼殺了女性主體的形成。追根究底，色情並不是性別歧視運作的唯一場域，更不是性別歧視最強的場域，更值得深思的是，有很多女人都已經能夠在色情世界中得心應手的悠游。

面對這個駁斥，MacKinnon 也有她的回應方式，她提出兩個論點：其中比較宏觀的第一種說法是用社會建構論來說明現階段女性能動主體之不可能，她認為現有的父權體制多多少少建構了女人，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真正屬於女人自己的「性」；換句話說，只要性別（也就是性的）不平等存在一天，我們就不可能看到女人「真正」的性。

比較微觀的第二種說法則嚴厲的質疑現實生活中女人所表現出來的具體情慾需求。換句話說，許多女人看起來是自發的想要性，享受性，但是 MacKinnon 認為事實上這些女人是不夠自知的，她們的慾望和享受是被建構出來的。女人當然想要更多的性，但是這種性絕不是簡單的、男人想像的那種性慾的滿足，因為，很多（在男性）看來不性感的事情（在女性看來）都是性感的（例如月下乘涼、觀看蝴蝶飛舞等等）。不管如何，女人的性和男人的性是截然不同的，

不過，假使如 MacKinnon 的社會建構論所言，在現有性別壓迫制度之下不可能形成女性情慾能動主體——因為，只要性別（也就是性的）不平等存在一天，我們就不能自以為女人已經掌握了她們自己的性而且可以在情慾的場域中操作並改變現實——那麼，我們似乎也沒有理由相信，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中，女性可以在任何其他場域發展出能動的主體性來。畢竟，女性的知識、教育、就業、氣質、能力、政治參與、文化生產等等都是在現有的性別壓迫制度之下建構形成的，都可能是女性「在現有社會壓迫和排擠中形成的自保策略」。這麼一來，女性解放還能指望用什麼方式壯大自己，突破父權呢？如果 MacKinnon 要說女性可以在這些其他方面有主體能動力，有抗爭的實際效果，但是在情慾方面就特別不能，那麼，她就還需要提出另一套更徹底、更細緻的宏觀社會分析，來解釋（而非斷言）情慾或者性在社會結構中有著什麼樣的特權或優先位置，以致於特別的難以被女性動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 MacKinnon 的社會建構論只是用來證明，某些女人此刻所表現出來的情慾能動力（erotic agency）是在現有社會條件之下創造的，因此是男性社會的產物，是片面的表現，是虛假的意識；那麼，同理推之，女性主義有什麼理由相信女性目前在知識、教育、就業、氣質、能力、政治參與、文化生產等等場域中發展的主體性不是虛假意識？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發言位置使得 MacKinnon 可以斷言別的女人的情慾需求和享受是虛假意識？這種發言對那些女人來說，又是什麼樣的權力效應？再說，當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說一

切的性都是男性的性，一切的色情都是性別壓迫的時候，這裡的異性戀假設又將置女同性戀情慾主體及其需求於何處？

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在思考色情和女性之間的關係時，常常流於簡化。例如，她們常常援引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所假設的消費模式就是簡單的吸收模式而已，它以為文字影像是直接而原封不變的進入主體沈睡的意識，然後按著設計者或創作者的計劃，或是照著主流霸權的意義詮釋架構，來塑造主體的意識和感受，順利完成「洗腦」的工作。在這樣的理解架構中，主體是一團等待模塑的爛泥，在強勢文化之下只有被殘害的命運。換句話說，在大眾文化的陷阱中，主體只是毫不反省的把觀看的東西內化，把被動的吸納入自己的思考感覺體系而已。

擁護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則回應，主體並不是這樣完全沒有自主能力的，主體在消費文化事物時總是主動的、選擇性的使用、重組、延伸、記錄、幻想、拼貼、著色那些過去曾經以及現在正在進入認知和感受範圍的文字影像；因此，即使在消費色情材料的過程中，主體也不是被動的、消極的吸收而已。社會文化和結構對於意識和價值觀甚至情感的模塑當然不可否認，但是這些模塑的力量也總是不斷遭受到某些主體的抗拒。（例如學生從來就不會全面接受教育體制的灌輸，人民從來不會全面接受官方的粉飾說法等等）

結構的模塑力量不需要再被誇大，主體的自主力量也不必再被輕視。如何讓色情平等的被使用，如何有自主性的觀看色情，如何掌握色情的生產機制，如何創造更多樣的色情，如何面對自身的情慾和需求，如何尊重他人的情慾選擇，這些都是我們更需要面對的挑戰。

每當我們害怕自己的慾望時，我們就已經奪去了自己的行動能力
沈默、隱藏、恐懼、羞恥 這些力量一向被強加在女人身上，以
便使我們無法知道（更遑論掌控）自己想要的。難道我們現在還要
把這些東西強加在自己的身上嗎？

--美國女性主義者 Amber Hollibaugh